

唐继尧评传

中国近代人
物评传丛书
谢本书



唐继尧评传

中国近代史
人物传记



序 言

很高兴地读到谢本书同志《唐继尧评传》的手稿。此书资料丰富、议论平实、文字流畅，不仅可以帮助读者全面了解唐继尧其人，而且 also 从一个侧面丰富和拓展了西南军阀史的研究。

军阀史是我早曾想要研究而又至今苦于力不从心的历史课题。早在二十年前，由于胡乔木同志的建议，杨东荪、刘大年、黎澍等同志发起筹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我曾参与其事，当时军阀即已被列为调查研究的重要项目之一。但是在“左”的干扰下，此项工作很快就陷于停顿。十年动乱期间，所谓“为军阀、土匪树碑立传”，更成为经常被罗织的罪名。连我辛苦寻访的大批北洋老人名单及通讯地址，也在查抄后不知被哪位“勇士”弄丢了。岁月悠忽，时过境迁，由于各种杂务的忙迫，现在我已经没有精力再专门从事军阀史的研究。但因上述历史原因，对

军阀史研究进展的关心则无时或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军阀史和其他许多重要历史课题一样，都从“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军阀史研究已经吸引了一大批史学工作者，特别是西南军阀史更有后来居上之势。西南军阀史研究会的成立，团聚了并促进了越来越多的同志努力从事此项研究。本书同志就是其中最为勤奋而又成果迭出者之一。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政治、文化状况也往往因此差别悬殊。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对于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都需要首先作区域性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为全国性的综合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读者将会有兴趣地读到，本书从产生的具体条件、头面人物的不同经历、地位与作用、投靠帝国主义的程度等五个方面，比较西南军阀与北洋军阀之间的差异，这既有助于我们了解军阀的共性，又有助于了解各个军阀集团的个性。作者没有停留于个人史事的陈述，而是透过唐继尧，对整个滇系军阀的内部和外部关系都进行了考察和剖析，这样自然就增加了此书的广度和深度。

作者还力求发扬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实事求是，不溢美，不掩恶，如实地、客观地叙述和说明唐继尧曲折复杂的一生。作者没有把对唐继尧的评价和

结论放在此书的前头，而是期望“读者在读完这本小册子以后，自然会作出必要的结论”。我认为，这不仅是一种很好的学风，而且也是一种很好的文风。应该尊重读者，尊重读者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历史著作的作者也同样需要把自己放在与读者平等的地位，努力为读者提供历史的原来面貌和认识历史的方法及依据，千万不要热衷于把某些主观武断的所谓“结论”强加于读者。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一部好的历史传记应该如同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如小说或电影）一样，应该给读者留有思索和回味的余地，不宜使人有一览无余之感，更不宜通篇充塞唠叨的解释。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

这本书使我增加了对于唐继尧和西南军阀的理解，但是并没有完全满足我的求知欲。正如作者在结束语中所指出的那样：“护国战争的后期及其战后，唐继尧逐渐堕落为滇系军阀的头子，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这里既和中国根深蒂固的社会经济条件密不可分，又与唐继尧个人野心的恶性膨胀联系在一起，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军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它既经产生之后便成为这个社会的重要支柱，并且明显地作为惰力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军阀史研究之所以必要，其意义正在于此。但为了进一步说明军

军阀产生的根源，恐怕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譬如产生军阀的社会土壤，就不宜只限于经济结构的探讨，必须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考察旧中国这个封建宗法农业社会，同时还必须对清末民初整个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列强侵华政策的演变，作进一步的解剖与探讨。当然，这样繁重的任务不能要求《唐继尧评传》一本书来完成，而需要我们更多的同志共同努力深入探讨。

我相信，《唐继尧评传》的出版将会引起人们研究滇系军阀更为浓烈的兴趣，同时也必将有更多的有关西南军阀史的佳作问世。

章开沅

一九八三年重阳于武昌南湖之滨

目 录

前	官	(1)
一	并非一个好的同盟会员	(5)
二	参与云南辛亥重九起义	(11)
三	北伐入黔，夺取了贵州都督	(22)
四	由黔返滇，追随袁世凯	(35)
五	大势所趋，投身反袁护国	(47)
六	对省外扩张引起的川滇黔战争	(68)
七	以护法为旗号的靖国战争	(83)
八	南北军阀的相互勾结	(103)
九	潜逃香港及其二次回滇	(121)
十	对外投靠帝国主义	(137)
十一	联省自治声中的表演	(146)
十二	最后的没落	(156)
	结束语	(173)
附：	唐继尧生平大事年表	(180)

前 言

云南首府昆明，是一个四季如春，鲜花盛开的城市，素有“春城”之称。在春城的东北角，有一座小山，名叫圆通山，属陞山余脉，是昆明著名的风景区之一。从本世纪三十年代起，圆通山就被开辟为公园，称为“圆通公园”。解放以来，这个公园的面积扩大了，由原来的十多公顷，拓展到二十六公顷，内经修缮，花鸟虫鱼、狮虎豹猴，皆有陈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每年三、四月，圆通山上的樱花和海棠花，漫山遍野地开放，花团锦簇，把这里变成了个花的世界，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人。

游人游览圆通山，欣赏了这花天花地之后免不了再提脚走几步，来到圆通公园后门附近的唐坟（唐继尧墓）参观。对于外地的人来说，也许是出于好奇；对于昆明人来说，唐坟却引起了他们复杂的感情，有怀念有惋惜，也有鄙弃。是的，唐继尧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对人民有过功绩，也有过罪过，因此后人站在唐坟面前，也就有着不同的感想。

唐坟是本世纪三十年代，由当时的云南省长龙云^①建造的。据记载：“这个坟墓是巨大的、花钱甚多的建筑物。它成功地把建筑学上的希腊式、威尼斯式、哥特式和中国式的风格融合在一起，还多少采用了不大协调的拉丁式的铭刻。”^②

唐坟前面有石狮、标干（华表），唐坟正面有一排石刻，唐坟之上还有许多石雕，气势颇为壮观。可是，经过十年动乱，唐坟亦遭破坏。现在唐坟前的一排石刻虽还保留，而其余的东西大多残缺不全，唐墓本身也被挖了一些窟窿。不过，唐坟的规模还依稀可见。

唐坟正中石刻写着：“会泽唐公冀赓墓”。两边的对联是：“功业须当垂永久，风云常为护储胥”。这是说，唐继尧的丰功伟绩应当永垂不朽，在那风云战乱的年代他常为滇军的保护者。后一句话也许说对了，而前一句话则未必确切。

在对联的左右两边，紧竖着八个大石碑，刻着一九一六年护国战争期间被推为军务院抚军长、护国战争后黎元洪的授勋令、一九一七年护法运动开始时被选为广州军政府元

① 龙云（1884—1962），字志舟，彝族，云南昭通人。早年追随唐继尧，1923年以后为云南省长，1945年为蒋介石免职。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后病逝北京。

② 美国领事馆关于《云南领事所在区域工商业发展的年报》（1935年），转引自（澳大利亚）霍尔著：《云南的地方派别（1927—1937）》（J.C.S.Hall: The Yunnan Provincial Faction 1927—1937），澳大利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60页。

帅、一九一八年广州军政府改组时被推为政务总裁，一九二四年孙中山致唐继尧关于推举其为广州政府副元帅等文件，以及周钟岳^①为唐继尧写下的长篇墓表。这些石刻合起来，大约是唐继尧一生中最精彩的部分。不过，即使是这些最精彩的部分，唐继尧在世的话，看了也会脸红。例如，一九一七年广州护法军政府推举唐继尧为元帅，虽经孙中山多次敦促，又派章太炎来滇劝驾，唐继尧仍坚辞不就。这说明了什么呢？

本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在昆明著名的滇池之滨的大观楼公园内，还矗立着一个唐继尧着军装、挎长刀、骑战马的大型铜铸雕像，相当威武。这个铜像先在香港用石膏做成模型，再在意大利用铜铸成，然后运回云南的。五十年代后期，这座铜像及其周围的栏干都不见了，有人说是大办钢铁时不见的。陈毅副总理一次来云南时还说：这样的东西到哪里去了？应当找回来。^②

综观唐继尧的一生，他确乎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之一，曾作过不少好事，对历史不为无功。然而，他毕竟最终以军阀之名了此一生。当然，军阀并非没有做过一件好

^① 周钟岳（1875—1955），字惺甫，号惺庵，白族，云南剑川人。辛亥后为云南军都督府秘书长，后曾任云南省代省长、省长。解放后为全国政协委员。病逝于昆明。

^② 《唐芸庵谈唐继尧生平事迹（1982年11月）》，潘汝演整理，未刊稿。唐芸庵（是唐继尧最小的妹妹，今年七十七岁）还建议，对唐坟应进行修缮。

事。唐继尧，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人士转化为中国西南地方军阀的头面人物、滇系军阀的头子，其成长、发家、演变、衰亡的历史，在地方军阀中具有某种典型意义。解剖一个唐继尧，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军阀的一些历史现象和重要特征。

一 并非一个好的同盟会员

唐继尧，字冀虞，云南省东川府会泽县城关人，一八八三年八月十四日（清光绪九年七月十二日）生于封建地主阶级家庭。他的“先世籍湖北荆州。明初有远祖从征入滇，官千户职，留屯曲靖。嗣迁居会泽，遂占籍焉”。^①“自先世以来，屡代科名相继”。^②其父唐学曾（字省三）是庠生，叔唐学闵（字阎如）为丁酉科举人。即所谓“累世均以科名显于乡里，父为邑中名宿”。^③

少年时代的唐继尧比较聪明，六岁入私塾，勤奋上进，“所读书，过目成诵”。一次，其叔父见有卖秧鸡的农民路过，乃以“水鸟”二字叫唐继尧也以二字相对，唐继尧略加思考即回答“云龙”。他说：“水中有鸟，故出水鸟。我以为云中有龙，故对云龙。”^④ 颇得家人与邻里的好评。十五

① 周钟岳：《唐继尧墓表》，见昆明市圆通山唐坟石刻。

② 庾恩赐：《再造共和会泽大事记》，1917年云南图书馆发行，第4页；《云南首义主干英杰会泽唐公史略》，1916年云南开智公司印，第5页。

③ 东南编译社编述：《唐继尧》，1925年震亚图书局发行，第1页。

④ 《云南首义主干英杰会泽唐公史略》，第6页。

岁时应童子试，会泽县令陈月溪见到唐继尧的考卷非常高兴，拟列榜首，但为忌者所毁；后为院试学使田某获知，乃加列榜前，补为博士弟子员。

一九〇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清廷“谕令停科举以广学校”，在中国实行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完全废止。还在这之前的一九〇四年，清政府已决定在各省选派留日学生。东川府周彩臣、会泽县王慎余乃备文推荐唐继尧赴昆明参加留日学生考试，东川府考取官费生四人，唐继尧乃其中之一。这一年是云南派出留日学生的高峰，达一百多人。其中到日本后仅入东京振武学校的就有三十余人，入其他学校的有八十八人。^①唐继尧出国前，其父领他拜见在昆明的著名学者陈荣昌，征询意见。陈荣昌重视实业，劝唐继尧学工科。于是，其父即要他填写工科。

那时滇越铁路尚未通车，唐继尧与省内留日学生一道，出黔湘，顺长江东下，抵上海，搭轮赴日本。到日本后，唐继尧感到“工业缓不济急，不如学陆军，异日庶可为国家效用”。^②遂入东京振武学校。在同学二百余人中，以唐继尧为最年少。一九〇五年八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受到当时潮流的影响，年轻的唐继尧很快加入同盟会。当时加入同盟会的云南留日学生有四十余人。然而，唐继尧又同时与少数人秘密组织“陆军团”，创设“武

① 《新纂云南通志·学志考》。

② 《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第8页。

学社”，刊行《武学》杂志；还参与了同盟会云南支部创办的《云南》杂志的织组工作。关于“陆军团”与“武学社”的性质，大体上也属于革命团体，因为它们“以革除满清，推倒专制为唯一目的”。①

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唐继尧，受到民族危机的刺激和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思想的感染，也希望为挽救祖国的灾难和危亡尽自己的一点力量。然而，究竟怎样挽救祖国，对他来说热情虽有，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和目的。少年时代的唐继尧留下了几首诗，可以说明他这一时期的情绪，我们试引二首：

仲春大雪②

百卉争春太不平， 梨花浓重柳花轻。
大公最是寒天雪， 点缀乾坤一样清。

戊申元旦③

世态炎凉恨不平， 苍生多少竟忧贫。
雄心起舞刘琨剑， 誓代天公削不平。

① 《唐继尧》，第2页。

② 引自《唐会泽遗墨》，无印刷日期及地址，书前扉页有章太炎1928年5月的题签。此诗创作的日期不明，手稿注明为“少年时作”。

③ 引自《东大陆主人言志录》，无印刷日期及地址。戊申，即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这两首诗，明显地表明了对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清朝封建统治的不满，对那个时代“恨不平”。虽然，他也要求舞剑“削不平”，可是对“不平”的世道，还停留在希望“大公报”的出现，使这个不平的世道能够“一样清”而已。所以，唐继尧此时除了醉心于“恨不平”之外，还“复以余暇研究阳明之学”，探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①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政府文部省发布了“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不仅限制留日学生的活动，而且“竟把中国和朝鲜并列，这完全暴露了它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②因此我国留日学生悲愤填膺，引起万余学生的抗议罢课，并分批启程回国。陈天华愤而蹈海，想以此来激励人们坚持斗争。唐继尧对这个行动却持反对态度，不同意罢课回国，甚至与部分留日学生，上书日本政府，希望取消此项规则，同时号召留日学生安心学习，“万勿相率回国，以至半途废学”。③然而经过中国留日学生的坚决斗争，并得到国际舆论的正当同情，日本政府被迫让步，答应了十多项条件，承认了中国留日学生会馆。这次斗争所取得的一定程度的胜利，是唐继尧所未曾想到的。

一九〇六年夏，唐继尧在振武学校毕业，考试成绩名列第一。④毕业后，唐继尧入金泽第九师团炮兵第九联队见

① 《唐继尧》，第3页。

② 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载《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7页。

③ 《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第9页。

④ 李根源：《雪生年录》，1944年曲石精庐重刊本，卷一，第12页。

习，充入伍生为二等兵。见习期满后，于一九〇七年六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这一期中国留日学生竟达一百九十九人^①，其中有孙传芳、李根源、刘存厚、罗佩金、李烈钧、程潜、尹昌衡、刘祖武等人。^②

一九〇八年四月，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发动和领导了云南河口起义，占领河口，向北进兵，清政府惊惶失措，企图借法兵平乱。消息传至日本，留日学生在东京神户锦辉馆发起云南独立大会，庆祝声援，参加大会的近万人。会议决

① 田文川：《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该校中国留学生》，《中日关系史论丛》第一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历城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投靠北洋派，逐渐成为北洋军阀直系将领，曾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等职，后被刺身死。

李根源（1870—1965），字印泉，号雪生，云南腾越（今腾冲）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后参加辛亥云南起义、护国运动、解放后为全国政协委员。后病逝于北京。

刘存厚（1885—1960），字积之，四川简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后参加辛亥、护国起义。大陆解放时逃往台湾。

罗佩金（1878—1922），字榕轩，云南澄江人。早年留学日本为同盟会会员，后参加辛亥云南起义、护国战争。1922年为唐继尧所害。

李烈钧（1882—1946），字协和，江西武宁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起义，护法时为孙中山参谋长。

程潜（1881—1968），字颂云，湖南醴陵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20年北伐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解放前夕为湖南省长。1949年8月起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任湖南省长等职。后病逝于北京。

尹昌衡（1884—1953），字硕权，号太昭，四川彭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四川都督，后改任川边镇抚使、经略使。

刘祖武（？—1922），字继之，云南昆明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前任云南讲武堂教官。辛亥后历任滇军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等。